

#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柳学信 曹成梓

**内容提要:** ESG 是全球通用的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实践,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可以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政策工具和市场解决方案。本文阐释了新发展阶段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基于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探讨了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并对其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借鉴。

**关键词:** ESG 新质生产力 价值标准 市场创新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 F0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24)11-0003-11

##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以加速推动生产力水平的跃升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核心<sup>[1]</sup>。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生产能力和要素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期<sup>[2]</sup>。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取向<sup>[3]</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sup>[4]</sup>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渐进性和继承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应是一个在继承传统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关键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瓶颈突破的过程<sup>[5]</sup>。因此,需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寻求既符合内涵要求,又适应国际规则体系的驱动因素,创造条件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界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等多维度搭建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从资本市场<sup>[6]</sup>、数字经济<sup>[7]</sup>等角度探讨了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参考。与传统增长范式不同,新质生产力是摆脱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具有可持续性、竞争性和包容性的新生产范式<sup>[8]</sup>。ESG 是一种关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的全球可持续投资实践,也是企业非财务绩效披露的主流框架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框架体系。从本质上看,ESG 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

收稿日期:2024-05-24;修回日期:2024-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双碳’目标下碳信息披露体系设计与效果研究”(22&ZD145)

作者简介:柳学信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70;

曹成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的时代内涵,追求长期价值增长、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 ESG 理念正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 ESG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而且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阐释了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结合 ESG 的发展背景,分析了 ESG 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契合之处,以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探讨了 ESG 作为全球通用的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新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实践,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使生产力发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定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借鉴。

## 二、ESG 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 (一) 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中国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塑造新发展动能的客观要求,也是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赢得主动权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型先进生产力<sup>[9]</sup>。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总结其时代内涵,顺应发展趋势。

第一,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工业化进程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生产利用率偏低,是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sup>[10]</sup>。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高污染和高消耗的工业化传统生产模式,其资源和动能的不可持续性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现阶段的发展要求<sup>[11]</sup>。步入新发展阶段,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保证<sup>[12]</sup>。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是党中央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以及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作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部署,凸显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新质生产力应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践行绿色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sup>[13]</sup>。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需要改革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发展模式,摒弃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以绿色发展为底色升级传统产业结构,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二,创新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会颠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sup>[14]</sup>。新质生产力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先进制造技术加速产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提出的,关系中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sup>[7]</sup>。进入新发展阶段,颠覆性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为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卡脖子”技术频繁出现也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阻碍<sup>[15]</sup>。如何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带动创新发展,关乎中国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能否赢得战略主动。因此,新质生产力应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具有前瞻性、主导性和高效能的生产力<sup>[16]</sup>。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解决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等制约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难题。

第三,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的全球扩张造就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效率与公平的两难困

境,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举措<sup>[17]</sup>。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sup>[18]</sup>。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加快变革生产力是中国由粗放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sup>[3]</sup>。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世界贫富差距格局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sup>[19]</sup>。从长远来看,新质生产力应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在此意义上,新质生产力应是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 (二) ESG 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从早期的道德投资到责任投资到可持续理念兴起再到实现企业可持续的 ESG 实践,ESG 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2004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Global Compact)发布报告《有心者胜(Who Cares Wins)》正式提出 ESG 理念,ESG 原则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重视。2006 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UN PRI),ESG 投资原则正式确立。ESG 投资也逐渐得到主流资产管理机构的青睐,从欧美走向了全球。2020 年 3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教师养老金(CalSTRS)、日本政府养老金(GPIF)、英国高校退休金(USS)三家大型养老金机构联合发布《携手共建可持续的资本市场(Our Partnership for Sustainable Capital Markets)》的公开声明,ESG 投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具有较大影响力。

促使 ESG 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制度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撒切尔政府私有化改革以及美国放松管制,将大部分社会责任目标让渡给市场去实现,但是市场并未能很好地提供社会公共物品。二是社会诉求,在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形成了大量规则制度等软法,这些理念、意识和文化促使政府不断完善其硬法。三是企业主导性,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有效应对环境、社会 and 治理的相关议题,企业才有机会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全球政策和制度演变的趋势下,企业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主体,通过践行 ESG 来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性大幅增加。四是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的加剧阻碍了经济发展,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全球气候问题等可持续发展挑战空前严峻,如何通过企业可持续行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以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是由中国新发展阶段下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决定的<sup>[20]</sup>。“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以及实现以绿色、效率、可持续为目标的经济社会增长方式,都需要 ESG 提供支持和保障。而且,ESG 契合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具体来看,ESG 中的环境维度体现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契合新质生产力践行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ESG 中的社会维度体现了企业发展对员工、供应链合作伙伴和社区的责任,有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ESG 中的治理维度强调了治理对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推进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三、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 (一)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相互补充,共同为 ESG 如何赋能新质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为如何实现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基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迈入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通过科学技术大力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为全球经济绿色复苏贡献中国力量。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指导企业将自身战略行动向可持续目标靠拢的微观理论基础,强调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平衡发展,为企业如何通过将 ESG 理念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基础。共同富裕理论强调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相统一,新质生产力的最终目标与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高度一致性,为如何通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提供理论基础。

## (二)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

本文以三大理论为指导,通过绿色赋能、创新驱动、共治共享和制度开放的“四位一体”模型,搭建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首先,ESG 是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发展理念,是推动绿色生产力的有效实践工具,通过绿色赋能实现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的目标内涵。其次,ESG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与制度创新,利用 ESG 披露和评级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创新,通过 ESG 投资引领资本市场服务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硬法约束和软法引导,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目标内涵。再次,ESG 是易被不同利益相关人接受的,可以客观地衡量企业综合表现的有效工具,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创造条件,通过共治共享实现新质生产力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最后,ESG 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工具,通过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为新质生产力更好适应全球竞争体系创造条件。

因此,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应在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企业实践、评价和投资体系以及数据平台建设五方面持续发力。第一,完善 ESG 政策体系,从顶层制度层面设计和规范 ESG 发展方向,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依据。第二,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遵循实质性原则,建设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第三,推动企业主动践行 ESG。企业通过主动践行 ESG,将 ESG 理念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重塑企业价值体系,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第四,通过建设 ESG 披露、评价和投资体系,以绿色技术驱动全链条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蓄势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路径指引。第五,发挥 ESG 数据平台支撑作用,完善 ESG 生态体系,形成良好的生态闭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系统保障。图 1 是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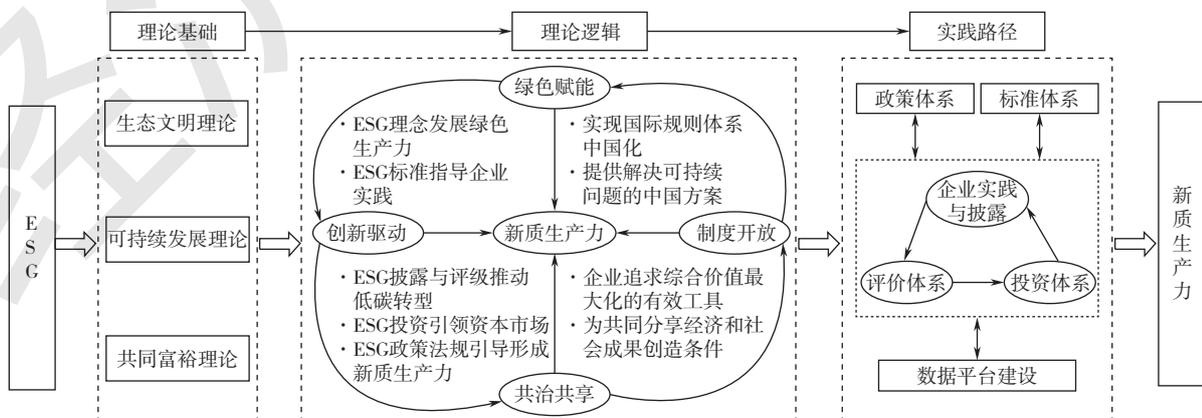


图 1 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 四、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 (一) 绿色赋能: ESG 是推动绿色生产力的实践工具

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完善全球环境治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当今全球的发展共识。面对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议题,中国也积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sup>[21]</sup>。在日趋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下,绿色低碳转型意味着产业发展不再依赖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而是将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与企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充分挖掘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潜力,推动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全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示范路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绿色发展为底色,通过科技创新寻找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发展路径。ESG 强调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治理体系的协调性,可以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单一追求利润转向更加综合平衡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更关注社会和环境的整体均衡,从而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贡献力量<sup>[22]</sup>。

ESG 理念指导下的企业实践,是加快绿色生产力发展的坚实基础。企业是践行国家战略目标和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主体,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先导力量<sup>[23]</sup>。受全球可持续发展压力、政策和制度转变、社会诉求等因素的影响,局限于企业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方式不能满足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亟需新的发展理念和评价体系指导企业发展实践,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sup>[24]</sup>。ESG 是企业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是推动企业创新和绿色转型的基础。在中国积极推广 ESG 理念、建立 ESG 披露标准、完善 ESG 信息披露,促进企业 ESG 实践,充分发挥 ESG 投资在推动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激励约束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有力抓手。具体而言,ESG 是一套兼具工具性和目的性的价值判断标准,涉及标准、监管、企业实践、信息披露、评级、投资、咨询服务、社会共识等活动。通过制定统一的 ESG 政策和标准体系,引领 ESG 生态系统高质量建设,以信息披露、评价评级和投资战略工具来促进企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可以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 (二) 创新驱动: ESG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市场与制度创新

ESG 是 21 世纪人类社会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全球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问题的伟大市场创新<sup>[25]</sup>。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而颠覆性科技创新的风险特性更高,需要通过市场把更多资源引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中<sup>[26]</sup>。一方面,ESG 披露和评级体系可以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创新。ESG 披露和评级作为一种重要的软监管机制,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sup>[27]</sup>。研究表明,ESG 披露和评级可以改善企业外部环境信息,为企业绿色发展提供激励相容的市场化治理机制<sup>[28]</sup>。通过构建合理的 ESG 披露和评级体系,可以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激励企业积极作为、预警企业非财务风险和指导投资行为,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另一方面,ESG 投资可以引领资本市场服务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创新激励、要素配置和产业支撑效应,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至关重要<sup>[27]</sup>。ESG 是投资驱动,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ESG 投资理念能够促进企业增加气候变化领域的投入,助力金融机构规避气候变化风险,推动监管政策引导资金流向气候治理领域<sup>[29]</sup>。而且,企业良好的 ESG 绩效表现可以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sup>[30]</sup>,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股票收益<sup>[31]</sup>。因此,以 ESG 理念引领企业实践,不仅可以获取制度层面及战略层面的合法性,而且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ESG 已成为政府利用制度约束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sup>[25]</sup>。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加

强制度保障,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绿色创新的实施成本,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激励和约束<sup>[32]</sup>。一方面,通过硬法约束和软法实践促进 ESG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目前,越来越多国家通过采纳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指南、国际规则等软法实践,制定正式法律规则等硬法,提高企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和治理水平,促进 ESG 实践和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国际组织(软法)和各国政府(硬法)制定和完善 ESG 标准、规范和政策,可以为 ESG 实践提供指导和支持。另一方面,规范的 ESG 政策法规可以促进企业与投资者的良性互动。政策引导是 ESG 理念与企业实践结合的重要推动力。受制于中国 ESG 信息披露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中国 ESG 投资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尚未建立完备且统一的 ESG 政策体系。从全球看,不同评级机构间的评级差异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ESG 评级分歧使得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真实的 ESG 情况,降低了 ESG 信息的可信度<sup>[33]</sup>。因此,完备的 ESG 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出台,可以消除社会公众、投资和监管各方对政策的认知偏差,提高 ESG 实践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 (三) 共治共享:ESG 推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共同富裕是新质生产力的终极目标,倡导以绿色发展为主线,科技创新赋能,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ESG 是一个兼具包容性和中性的词汇,包含环境、社会和治理三方面的内在需求和目标,使得 ESG 成为既可以客观地衡量企业综合表现的有效工具,又容易被企业、非政府组织(NGO)、政府等不同利益相关人接受。ESG 倡导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关注绿色环保、节能降碳,关注人的价值,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推动企业从单一追求经济利益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推动企业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创造了条件。

第一,ESG 中的 E(environmental)——环境维度主要包括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能源、污染和环境管理体系等核心议题,体现了企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ESG 的首要维度是实现环境责任,确保经济活动对气候和环境产生有益影响。在 ESG 的引导下,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对自然和环境的影响也趋向正面,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一脉相承。

第二,ESG 中的 S(social)——社会维度主要包括员工、供应链合作、回馈本地及社区发展和企业产品及服务责任等核心议题,是企业对其生存和成长的社会系统的责任和义务。ESG 中的社会维度要求企业首先要对员工负责,关注员工的福利,以企业的发展带动员工的共同富裕;其次要打造良好的供应链关系,助力供应链合作伙伴形成共同富裕;最后要积极回馈社区,注重社区公平,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的创造。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也是 ESG 中社会维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第三,ESG 中的 G(governance)——治理维度强调企业治理体系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特别是通过有效的治理制度和机制促进环境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协调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CSR)不同,ESG 将治理纳入机制设计中,使其能够自我实施和自我发展。治理维度既重视企业的股东、董事和监事等正式制度和机制,也重视企业文化和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ESG 中的治理维度所关注的企业反竞争行为以及贿赂和欺诈等诸多商业道德相关问题,共同为构建企业健康发展的道德底线提供了引导和规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同时也助推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和谐共进。

### (四) 制度开放:ESG 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工具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构建对本国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是

能否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關鍵<sup>[34]</sup>。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对国际社会负有大国责任。大力发展 ESG 有利于抢占全球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因此,ESG 是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期增强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发言权的重要机遇。

一方面,通过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实现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ESG 标准是新的竞争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相比于道德投资和社会责任等传统的投资理念,是更具操作性的理念及方法体系,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实践。在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欧盟等组织的推动下,ESG 已成为国际主流的企业可持续披露与企业评价方法,正在加快形成全球统一的企业 ESG 标准体系。通过 ESG 标准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在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对话,有利于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且通过在贸易投资规则和规制、生产管理和标准等方面进行对接与协调,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安全有序融合,实现中国制度创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另一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实现国际规则体系的中国化。ESG 标准制度体系不仅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指导标准,而且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综合体现<sup>[35]</sup>。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面临诸多壁垒,严重制约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缺乏适应本土企业的 ESG 标准体系,会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导致企业在全世界竞争中的企业价值被严重低估、竞争力受限。在此背景下,ESG 不仅可以增加中国在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国际对话,有利于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而且有利于在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中体现中国国情的重要性议题,为全球提供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

## 五、ESG 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 (一) 完善 ESG 政策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策指引

完善顶层制度框架搭建,为中国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依据。一方面,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宏观层面出台统一的 ESG 相关法律制度及监督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基于新发展理念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借鉴国际经验,制定本土 ESG 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强制性披露范围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尚无针对全范围金融产品的宏观层面的可持续性分类体系。欧盟通过制定《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和《欧洲绿色协定》两个核心框架性文件,以及三个信息披露的法律支柱——《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和《欧盟分类目录(EU Taxonomy)》,构建了 ESG 价值链的“信息流”,指引 ESG 从立法、投资等层面充分落实可持续发展。未来可以借鉴欧盟经验并充分考虑中国企业的实际,制定符合国情的 ESG 顶层制度框架,为中国 ESG 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推动建立企业 ESG 披露、评价和投资政策体系。ESG 信息披露不足和评价标准不清晰,是阻碍 ESG 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以点带面逐步布局 ESG 强制披露政策,制定企业 ESG 信息披露框架,包括披露原则、披露标准、披露指引及披露报告的战略作用和适用范围等。针对上市公司,应在 ESG 信息披露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建立强制披露制度。其次,建立信息披露的考核激励机制和明确的 ESG 披露奖惩制度体系,出台具有针对性的、方式多样的奖补政策。最后,构建完善的 ESG 投资体系。对提供优质 ESG 投资和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贴息、费用补贴、风险补偿、业务补助等多种方式的奖补。

### (二) 构建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的 ESG 实质性议题。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 ESG 标准体

体系建设旨在使企业资源更趋向创造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更注重对企业核心产品和服务所创造的环境社会价值的全面关注,从而引导企业回归本质责任,通过商业模式、产品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中国 ESG 标准体系建设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遵循重要性和实质性原则,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不仅要注重叙事方式和重要议题的中国化,利用 ESG 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充分考虑对环境、社会与人类有重大影响的、体现中国国情的重要性议题,关联的主要利益方比如监管机构、消费者和社区与公众等,实现国际规则体系的中国化,而且要充分考虑对创造企业利润和价值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ESG 议题,关联的主要利益方有投资者、管理团队及员工、供应商等。

协同各方主体,共同推动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建设。首先,成立专门的 ESG 标准制定机构,构建中国 ESG 标准体系。中国特色 ESG 标准体系应该包括“1+N+X”体系:“1”是 ESG 的通用标准,即通用共识类核心共性议题;“N”是行业标准,即行业上下游实质性议题;“X”是专项标准,即专项特色实质性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其次,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投资机构、研究机构、企业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应形成紧密合作,参与制定 ESG 标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实践。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鼓励信息共享,以确保标准体系的公正性和全面性。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和企业,在国际性和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经营主体规模和行业特点,制定通用 ESG 信息披露标准。同时,应鼓励相关机构参与制定 ESG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自主制定一批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 (三) 推动企业积极践行 ESG,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将 ESG 融入企业发展愿景和战略,并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落实。中国企业的 ESG 实践落后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对 ESG 理念的社会认知不够深入,企业作为实践主体尚未认识到 ESG 的重要性,并未发挥其践行 ESG 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将 ESG 融入企业的未来前景,就要做好 ESG 的顶层规划,将 ESG 理念作为企业发展目标和文化驱动发展的重要一环。其次,结合统一的专业评估管理工具,设置内部认可的 ESG 实践关键绩效指标(KPI),通过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现有执行项目的整体设计、内部协调与具体实施方案,进而形成 ESG 实践框架,实现阶段性目标设置并持续跟踪,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优化和更正,将 ESG 行为标准与企业发展战略进行有机融合。同时,在构建统一的 ESG 行为标准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更多上市公司披露 ESG 专项报告,将 ESG 行为标准落实到产品、服务和业务运营,成为推动企业经营的重要力量。

将 ESG 绩效体系融入企业反馈机制。在现代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中,促进 ESG 发展还需要完善的反馈机制。ESG 在中国企业的践行中尚需要一套成熟的反馈机制,才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愿景—战略—组织—实践—反馈机制。反馈机制要着重考察企业 ESG 实践情况,如环境责任方面重点考察企业在碳排放、能耗指标、污染物排放、绿色业务占比及转型、环保信息披露等方面表现;社会责任方面重点考察企业在员工管理与稳定性、客户满意度与投诉、供应链关系、社区贡献、产品和服务责任等方面表现;公司治理方面重点考察企业在股权结构、大股东行为、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披露水平、商业行为准则等方面表现。以结果验证过程,以反馈机制查验企业 ESG 在愿景、战略、组织、实践的应用情况,形成企业 ESG 体系闭环。

### (四) 建设 ESG 评价和投资体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转型指引

构建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ESG 评价体系,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中国产业面临绿色低碳转型的问题,但缺乏科学有效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来引导和规范企业在绿色低碳方面开展实践。因此,亟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构建与中国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ESG 评价体系,可为企业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切实可行的抓手,从而推动产业低碳健康发展。而且,在全球减排总量目标一定的约束之下,钢铁、电力、水泥、交通、建筑等高耗能、重污

染行业的生产必将受到直接的影响。ESG 评级结果可以反映企业 ESG 行为的趋势,能够对利用传统能源、污染和排放源头等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技术革新或者引入清洁能源的使用,促进清洁能源开发和利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能源领域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金融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完善 ESG 投资体系,为产业转型与布局提供资金保障。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原则,制定 ESG 投资发展目标和政策体系,引导资本兼顾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双重目标,以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政府部门与机构应根据自身职能,分类制定和完善企业 ESG 投资各领域的相关规范条例,完善企业 ESG 投资的规范制度和监督机制,形成统一整体的制度框架,为促进和规范中国 ESG 投资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其次,建立监督和问责机制,明确企业 ESG 投资的监督主体、职责内容和问责方式,通过建立企业 ESG 投资事前评估和事后控制的全流程监督体系,以维护和鼓励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企业 ESG 投资。最后,制定促进企业 ESG 投资的激励政策。探索制定全方位、多手段并举的企业 ESG 投资激励政策。根据中国国情,结合企业 ESG 投资组织机构和市场主体的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税收激励、融资帮扶等异质性激励手段,动员国有企业、主流金融机构积极践行 ESG 投资,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

#### (五) 发挥 ESG 数据平台支撑作用,完善 ESG 生态体系

加强 ESG 数据平台建设,有效服务 ESG 披露、评级与投资实践。ESG 数据贯穿于企业披露 ESG 信息、评价评级机构的评级、金融机构依据 ESG 评价评级进行投资、监管机构监管的生态系统全过程。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在 ESG 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不仅可以服务供应链产业链上的企业更好披露 ESG 信息,而且可以帮助市场评级和咨询中介以及监管机构更好发挥作用,并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比性,从而可以有效服务 ESG 披露、评级与投资实践的全过程。因此,需要通过多方发力,汇集政府、企业、研究机构 and 行业协会等力量,依托现有的科技创新力量,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通过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等手段着力打造 ESG 数据应用平台。同时,加强各方参与主体和数据平台之间的协同合作,积极融合各方数据,让数据平台融入 ESG 披露、评级和投资的全过程,提高 ESG 数据平台的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能力,也是完善 ESG 生态体系的必要举措。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促进完善 ESG 生态体系。ESG 生态体系涉及政策引导、标准制定、信息披露、监管投资、评级、咨询服务和社会共识等方方面面的活动。目前,中国 ESG 生态系统已经形成,可大致划分为监管机构、标准制定者、资金持有者与管理者、ESG 评级与数据提供者以及企业等主要主体,涉及顶层设计层面的政策监管和质量基础设施层面的标准制定,微观主体互动层面的企业实践与披露、评价评级与投资,以及服务保障层面的人才、研究等活动<sup>[36]</sup>。政府的监管政策和各方共识的标准体系为 ESG 生态系统提供宏观制度基础,围绕企业这一核心,投资者提供动力来源,中介机构提供数据、信息支持,服务机构提供人才、技术、工具等。以政府和标准制定机构为核心的宏观行动主体与以企业、投资者、ESG 中介为核心的微观实践主体形成良性互动。

#### 参考文献:

[1] 梁炜,朱承亮. 颠覆性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内涵及监测框架[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4(3):38-47.

- [2] 黄群慧, 盛方富. 新质生产力系统: 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 改革, 2024(2): 15-24.
- [3] 文丰安, 肖华健.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探析[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7(2): 13-23.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1).
- [5] 周文, 许凌云. 再论新质生产力: 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 改革, 2024(3): 26-37.
- [6] 林春, 文小鸥. 资本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 理论逻辑、现实问题与升级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1(2): 66-75.
- [7] 罗爽, 肖韵.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2): 29-40.
- [8] 柳学信, 曹成梓, 孔晓旭. 大国竞争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1): 145-155.
- [9] 武峥.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J]. 新疆社会科学, 2024(2): 20-28.
- [10] 李梦欣, 任保平. 新中国 70 年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演进[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 10(5): 62-77.
- [11] 寇江泽, 李红梅, 齐志明, 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4-03-04(9).
- [12] 任保平, 慕小琼. 新发展阶段我国绿色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23, 39(4): 5-16.
- [13] 喻思南.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N]. 人民日报, 2024-04-08(19).
- [14] 赵西君, 宋金平, 郭剑锋, 等. 全球视域下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借鉴和路径选择[J]. 经济地理, 2024, 44(2): 1-9.
- [15] 肖广岭. 以颠覆性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驱动创新发展[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13): 55-61.
- [16]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6): 137-148.
- [17] 陈海若. 共同富裕: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难题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回答[J]. 经济学家, 2024(5): 25-35.
- [18] 张秀生, 曾凌尧. 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意蕴与实践指向[J]. 江汉论坛, 2024(5): 10-16.
- [19]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20] 柳学信. 构建中国特色 ESG 体系, 赋能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EB/OL]. (2024-07-04)[2024-09-12]. <https://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137691.html>.
- [21] 许彩慧, 张开. 全球产业链绿色转型——“双碳”窗口期下中国的机遇、挑战和路径[J]. 国际贸易, 2023(12): 29-39.
- [22] 王大地, 黄洁. ESG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1.
- [23] 尹西明, 薛美慧, 丁明磊, 等.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主导型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逻辑与进路[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4): 29-37.
- [24] 郑元植, 王卓涵, 蔡懿, 等.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 ESG 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J]. 技术经济, 2023, 42(3): 64-77.
- [25] 柳学信. 中国 ESG 生态系统建设迫在眉睫 | 解码 ESG 价值路径[EB/OL]. (2023-10-13)[2024-09-12]. <https://www.chinatimes.net.cn/article/131201.html>.
- [26] 赵展慧. 推动资本市场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N]. 人民日报, 2024-04-15(18).
- [27] 刘柏, 卢家锐, 琚涛. 形式主义还是实质主义: ESG 评级软监管下的绿色创新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23, 26(5): 16-28.
- [28] 胡洁, 于宪荣, 韩一鸣. ESG 评级能否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验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7): 90-111.
- [29] 陈骁, 张明. 通过 ESG 投资助推经济结构转型: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学术研究, 2022(8): 92-98.
- [30] YU E P Y, GUO C Q, LUU B V.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transparency and firm value[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8, 27(7): 987-1004.
- [31] 张慧. 企业 ESG 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市场表现——基于双重代理成本的视角[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3, 25(03): 73-88.
- [32] 邹起浩, 任保平.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2): 12-27.
- [33] CHATTERJI A K, DURAND R, LEVINE D I, et al. Do ratings of firms converge?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investors and strategy researcher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8): 1597-1614.
- [34] 李优树. 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我国的机遇与挑战[J]. 人民论坛, 2023(23): 90-93.
- [35] 孙忠娟, 罗伊, 马文良, 等. ESG 披露标准体系研究[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1.
- [36] 柳学信. 强制 ESG 信息披露条件正在逐步成熟[EB/OL]. (2022-04-25)[2024-09-12]. <https://www.nbd.com.cn/articles/2022-04-25/2239620.html>.

##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U Xuexin, CAO Chengzi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shaping new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a necessary option for gaining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aracterized by sustain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inclusiveness depart from high dependence on material resource inputs and high carbon emissions, gui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which pursues long-term value growth and balances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highly fits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coming a meaningful wa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riving role of ESG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global capital market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G is a globally applic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sustainable practice that is both instrumental and purposeful. It is an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innovation for realizing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reover, it can provide rich policy tools and market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of ESG reflects the rol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ESG reflec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e development to employees, supply chain partners and communities, contributing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of ES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ng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new era and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value of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sphere model of green empowerment, innovation-driven, comm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 and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ESG empow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ways for ESG to empow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system, standard system, disclosure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vestment system, and data platfor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reshaping the corporate value system, generating momentum for new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ynamics, stimulating internal market forces, an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ES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value standard; market innov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范合君;魏小奋